



邢春丽◎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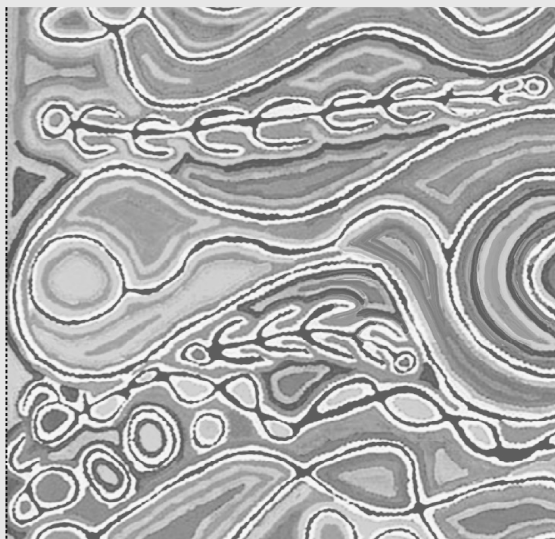
澳大利亚原住民小说与 非原住民小说的历史批判研究

Indigenous and Nonindigenous Australian Novels:
A Critical Historical Perspective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邢春丽◎著

本书受到北京市支持『双一流』高校建设项目资助，经费代码为ZF20281806

澳大利亚原住民小说与 非原住民小说的历史批判研究

Indigenous and Nonindigenous Australian Novels:
A Critical Historical Perspective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对比解析六部具有代表性的澳大利亚小说(三部非原住民小说《树叶裙》《忆巴比伦》《神秘的河流》,三部原住民小说《潘姆崑》《心中的明天》《卡奔塔利亚湾》),并运用批判性白人研究(Critical Whiteness Studies)理论揭示小说文本中官方历史叙事和原住民口述历史之间的张力,探讨澳大利亚身份政治问题及左翼史学家的主张对六位作家创作过程及写作风格产生的影响。本书作者认为,六部小说通过复调式历史叙述,在白人主体和原住民主体之间构建起主体间性空间,对增强澳大利亚民族-国家身份认同和彰显澳大利亚文学的地方特色具有重要的意义。本书适合从事澳大利亚文学及文化研究的广大师生及其他相关研究人员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澳大利亚原住民小说与非原住民小说的历史批评研究/邢春丽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

ISBN 978-7-313-22301-2

I. ①澳… II. ①邢… III. ①小说评论—澳大利亚

IV. ①I61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65194 号

澳大利亚原住民小说与非原住民小说的历史批评研究

**AODALIYA YUANZHUMIN XIAOSHUO YU FEIYUANZHUMIN XIAOSHUO DE LISHI
PIPING YANJIU**

著 者: 邢春丽

出版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200030

印 制: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151 千字

版 次: 2020 年 1 月第 1 版

书 号: ISBN 978-7-313-22301-2

定 价: 68.00 元

地 址: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电 话: 021-640712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 10.5

印 次: 202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 025-83657309

前 言

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澳大利亚依然笼罩于宗主国英国的文化阴影之下,处于“文化卑微”的状态。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中的原住民主题对探索其民族化道路,彰显地方性特色,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涉及原住民主题的澳大利亚小说文本中,对历史的反思与重构占据了叙事的核心位置。

在澳大利亚殖民开拓时期,官方历史以构建欧洲中心主义的殖民帝国神话为目的而修撰,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白人因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而自命为殖民地的开拓者和文明的化身;原住民则被视为“低等民族”,懒惰、无知、堕落、不思进取的脸谱化形象使其在历史叙事中处于被描述的客体地位,沦为斯皮瓦克(Spivak)所说的无法发声的“底层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创伤消解了单一文化和单一真理的观念,西方文明独霸一方的状态被打破,文化的多元性逐渐显现出来,世界范围内反抗殖民压迫的民族运动风起云涌。在澳大利亚,原住民争取平等权益的运动对澳大利亚殖民开拓时期充斥着白人霸权和种族歧视的历史叙事提出了挑战。

澳大利亚历史学界在殖民时期的历史书写方面存在很大的分歧。左翼史学家主张从原住民视角出发对殖民时期的历史进行修正和重新解读,而右翼史学家则反对重新书写殖民历史,认为左翼史学家夸大了欧洲移居者与原住民的冲突,却忽略了那一时期澳大利亚社会中积极的一面。围绕殖民时期历史修撰的论战事关澳大利亚的文化历史渊源及民族-国家身份的塑造,在澳大利亚的文化界也得到了热烈的响应,小说叙事成为文学与历史对话的平台。

本书所选的六部作品将相互对抗的历史观以复调形式呈现于小说文本之中,从情节建构到叙事策略都与原住民反对代言、寻求自我表达的身份政治问题紧密相关。非原住民作家在创作与历史主题相关的作品时,既要体现原住民在民族-国家身份认同中的地位,又要避免挪用原住民文化或者试图为原住民代言。原住民作家则将口述传统融入小说叙事,用原住民与土地所保持的纽带关系全面诠释原住民身份,实现自我表达。

身份政治问题不仅促使澳大利亚作家在创作历史题材的小说时改变叙事手法,也对文学批评的解读方式提出了挑战。澳大利亚境外的文学批评对有关原住民和白人关系的历史小说文本的解读仍存在许多误区,目前还没有比较系统的研究。到目前为止,文学研究者在解读澳大利亚的历史小说及原住民作家的作品时大多运用后殖民主义理论,原住民作家及学者在理论界和批评界的声音却很少受到关注。然而,后殖民主义理论站在后殖民立场上谈族际间的混杂和融合,与殖民帝国的霸权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共谋,无法全面体现原住民和白人的社会权力不对等的社会现实。

本书基于两位原住民学者的理论观点,运用批判性白人研究理论解析以殖民历史及原住民身份为主题的六部小说。玛西亚·朗顿(Marcia Langton)深入地剖析了澳大利亚文化领域建构原住民身份时所表现出的主体间性,为本书作者解读六部小说提供了较为契合的文化批评语境。艾琳·莫顿-罗宾森(Eileen Moreton-Robinson)是澳大利亚批判性白人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她在美国批判性白人研究理论的基础上,从澳大利亚原住民与白人关系的角度审视及批判白人特权,为本书解析有关澳大利亚历史及原住民题材的六部小说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参照。即使在澳大利亚本土,批判性白人研究在文学批评中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运用,相关著述仍比较匮乏。

本书结合批判性白人研究理论,深入剖析了原住民作家和非原住民作家在小说文本中呈现白人与原住民关系时各具特色的叙事策略,追踪了在身份政治问题的影响下澳大利亚历史小说在创作和批评中的发展轨迹。通过对六部小说的对比解析,本书得出结论:小说文本中的

白人身份和原住民身份并非二元对立的本质主义概念,而是在协商和对话之中不断得到重新界定。小说叙事以原住民文化为核心构建主体间性空间,使原住民主体与白人主体得以通过对话与协商形成相互认可、相互建构。六部小说借助文学想象,为两极化的历史叙事提供了寓言式的和解途径。它们的共同寓意是,白人主体只有放下居高临下的姿态,认可并尊重原住民社会的规约律法和文化传统,了解原住民与土地和自然所达成的默契关系,才能够与原住民主体共同建构对话式的主体间性空间,达到视界上的融合。小说中复调式并置的殖民叙事和原住民口述历史产生的文本张力,改变并丰富了人们对原住民文化和历史的理解。

本书是我历经五年寒暑的博士研究以及澳大利亚访问学习一年所结出的青涩果实。为学之路尽管艰辛坎坷,却有如水木清华的校园,处处是风景,时时见关爱。

衷心感谢清华大学陈永国教授的精心指导。他学识渊博,富有洞见,对本书的选题和框架结构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他不仅是我学术道路上的方向标,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豁达的胸襟也是我为学为师的表率,使我终身受益。

2015—2016 学年我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访学期间,得到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安·布鲁斯特(Anne Brewster)副教授的悉心指导。我们在每月一次的面谈中深入讨论了澳大利亚学术界对书中涉及的原住民身份诠释及批判性白人研究的最新成果和观点,并共同参加了多个国际会议及其他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学术交流活动。在安的介绍下,我结识了多位澳大利亚文艺批评界的专家及知名作家,从与他们的交流中获益良多。

感谢清华大学外文系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的王敬慧教授和北京大学必和必拓讲席教授大卫·沃克(David Walker)。在他们的鼓励和引荐下,我多次参加北京四大澳研中心组织的学术交流活动,与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沃克教授是澳大利亚艺术科学院院士,是澳大利亚历史学界的泰斗,为我博士论文的历史批评视角下的解读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

另外,还要感谢澳大利亚政府下设机构澳中理事会(Australia-China Council,简称ACC)。我的选题“当代澳大利亚小说中的白人与土著关系”得到了2014—2015年度ACC优选项目基金的资助,为我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提供了经费支持。

本书还得到清华大学的曹莉教授和王宁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马海良教授和王丽亚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建平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的郭英剑教授、北京语言大学的宁一中教授的指点与帮助,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感谢爱人和儿子几年来给予我的理解和支持,尤其是在我去悉尼访学的一年里,爱人尽管工作辛苦,依然将家里家外安排得井井有条,儿子也乖巧懂事,在管理自己生活和努力学习的同时,还为父母带来了精神上的慰藉。

邢春丽

目 录

第 1 章 绪论：历史、原住民与澳大利亚小说 1

- 1.1 澳大利亚小说与历史的对话 / 2
- 1.2 澳大利亚小说中的身份政治 / 7
- 1.3 原住民身份的界定 / 10
- 1.4 批判性白人研究与澳大利亚小说 / 12
- 1.5 研究意义及论文框架 / 20

第 2 章 白人主体反思的殖民历史 25

- 2.1 原住民与国家奠基神话 / 25
- 2.2 《树叶裙》：寻求精神救赎 / 28
- 2.3 《忆巴比伦》：跨越语言藩篱 / 41
- 2.4 《神秘的河流》：质疑奠基神话 / 53
- 2.5 小结 / 64

第 3 章 原住民主体重构的殖民历史 67

- 3.1 原住民口述传统与英语叙事 / 68
- 3.2 《潘姆崑》：原住民社会的“三层真相” / 71
- 3.3 《心中的明天》：原住民混血儿的身份回归 / 79
- 3.4 《卡奔塔利亚湾》：原住民视角的自主家园 / 93

3.5 小结 / 108

第4章 原住民身份衍生的主体间性空间 110

4.1 争议历史与主体性建构 / 110

4.2 原住民主体与原住民家园的相互建构 / 112

4.3 白人主体与原住民主体的相互建构 / 118

4.4 小结 / 124

第5章 结论：争议历史的寓言式解读 125

参考文献 129

索引 155

第1章

绪论：历史、原住民与澳大利亚小说

文学作品产生于特定的时代，不可能脱离历史、社会、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而存在于真空之中。正如赛义德(Said, 1984: 4)在《世界、文本和批评家》一书中所指出的，文本是“世俗的”，是它“赖以产生和试图阐释的社会关系、人类生活和历史时期的一部分”。在20世纪初刚刚踏上民族化道路的澳大利亚文学中，这种“世俗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文学作品在复杂而又卓绝的澳大利亚民族-国家身份建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直至今日，学界对于澳大利亚殖民时期的历史编纂仍存在着诸多争议，原住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殖民帝国的合法性也一直遭到原住民的质疑。1901年联邦政府成立以来，在文学作品探求民族身份、建构地方历史的过程中，原住民成为其至关重要、无可回避的话题。一方面，原住民元素的注入为澳大利亚文学建构民族-国家身份增添了本土特色。虽然原住民没有书面文字，但几万年流传下来的原住民传说、岩画、咏唱、舞蹈、身体彩绘及各种宗教仪式体现了原住民的历史文化传承及与古老的澳大利亚大陆的土地和自然生态休戚相关的宇宙观^①。另一方面，被宗主国抛弃、被西方文明边缘化的欧洲移居者

^① 学界普遍认为澳大利亚原住民在大约五万年前从印度尼西亚移居而来。在位于新南威尔士西南部的芒戈湖发掘的原住民骸骨是已知最古老的骨架，经考古学鉴定证实距今三万八千年。而且，骸骨上还发现了赭石的痕迹，表明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化可以追溯到至少四万年前。

力求在原住民文化中寻求一种精神归属,从而使澳大利亚文学摆脱一直以来面临的“文化卑微”^①困境。文学评论家 J. J. 希利(Healy, 1989: 291 - 293)指出,作家们对澳大利亚的文明根基“普遍持有一种悲观主义态度”,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原住民才能体现出生活在澳大利亚的真正价值”,“20 世纪澳大利亚文学的主要能量是通过想象使原住民得以回归”。

在涉及原住民主题的澳大利亚小说文本中,对历史的反思与重构占据了叙事的核心位置。非原住民作家的小说作品主要从白人主体角度对殖民历史进行反思和自我批判,原住民作家的作品则利用原住民口述传统和其他形式的文化传承重构从原住民视角出发的历史,二者从不同视角表达了欧洲殖民者和原住民在“边疆地带”(the frontier)“初次接触”(first contact)^②时具有争议的历史(contested histories),以此对抗殖民历史文本中的单一霸权叙事。

1.1 澳大利亚小说与历史的对话

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1966: 257)指出,“一部清晰的历史……永远不能完全避开神话的性质”。在澳大利亚殖民开拓时期,官方历史以构建欧洲中心主义的殖民帝国神话为目的而修撰,受到西方社会思维范式的局限,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尽管澳大利亚大陆的原住民从大约五万年前开始就居住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但法律上这块大陆却被定义为“无主之地”(terra nullius)。原住民的土地遭掠夺,社会被瓦解,文化受摧残,西方殖民文化的冲击使原住民社会遭受了巨

① “文化卑微”(Cultural Cringe)一词出自澳大利亚文学评论家 A. A. 菲利普斯(Arthur Angel phillips)1950 年发表的同名文章,他指出澳大利亚的读者往往将澳大利亚文学看作是英国文学成就的附属品,澳大利亚作家写作时会有一种文化卑微感,要努力迎合读者,因而制约了他们的创造力(Nile, Richard & J. Ensor, 2009)。

② “边疆地带”和“初次接触”是澳大利亚历史文献中普遍使用也非常重要的两个术语。“初次接触”指的是欧洲殖民者登上澳大利亚大陆与原住民遭遇之后发生的交往和冲突,由于英国殖民者在澳大利亚各个地区开发的时间不尽相同,它大概涵盖了从 1788 年开始到 19 世纪中叶以前的历史时期。而“边疆地带”一词则专指殖民者与原住民“初次接触”的地域。

大创伤。在官方历史文本中,原住民被视为“低等民族”,是“一种悲剧性的和令人厌烦的存在”及“进步法则的牺牲品”(麦金泰尔,2009: 4)。

20世纪50年代以后,澳大利亚原住民在世界范围内反抗殖民压迫的民族运动的鼓舞和影响下,也要求享有与白人同等的权利,并要求白人归还掠夺的土地。1962年,澳大利亚原住民获得了选举权。1967年,在澳大利亚的全民公决中,绝大多数人赞同将原住民纳入全国人口普查。在澳大利亚国内,学界围绕着原住民身份、土地所有权、“被偷走的一代”(the Stolen Generation)和民族和解等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论战,早期充斥着殖民霸权和种族歧视论的历史叙事也受到了质疑。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认为,社会的每一个层面都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没有纯粹的“自然规律”,历史学家所设想的“无功利性”社会研究“只会产出脱离社会现实的知识”,“社会是人为构建的,是人类创造的产物,而不是一种‘自然’现象,它可以发生系统的变化和变革,因此,不应把社会看作是必然的结局”(1999: 316)。也就是说,重现历史事件和进程的叙事话语并非中立的媒介形式,历史学家在修撰历史时会受到不同意识形态的影响,其叙事话语对历史事件的“情节编排”(emplotment)会带有特殊的政治意图。随着考古学和人类学关于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化的研究成果的问世,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原住民文化的丰富内涵,原住民在澳大利亚历史中的无声状态也被打破。人类学家W. E. H. 斯坦纳(Stanner)在1968年的博埃尔系列讲座中指出,从1788到1938年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在记述澳大利亚历史的各种档案和著作中,原住民几乎都不见其名,即使有也不过是“一个悲哀的注脚”(1969: 24)。斯坦纳认为,这并非偶然现象,而是“结构上的问题”,“是精心设计的将整个图景象限排除在外的观点写照”,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种“遗忘崇拜”(1969: 24 - 25)。斯坦纳将这一现象称为“澳大利亚大沉默”(the great Australian silence),它用同化原住民的原则试图抹杀历史的另一面。他指出,要想打破这种沉默,需要放下欧洲人的种族优越感,走出欧洲中心主义,深入到对以口述历史为特色的原住民文化的研究中去。斯坦纳的批评对许多视野狭隘的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是一

种谴责,也向学者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不容置疑的现实面前他们需要革新想法,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①

原住民争取平等权益的运动对早期殖民历史叙事的权威性提出了挑战,从20世纪中叶开始,在澳大利亚左翼史学家当中掀起了一股修正和重新解读殖民时期历史的热潮。他们认为,对于涉及原住民遭受歧视、侵害甚至屠杀的创伤历史,单凭官方的历史档案无法做出客观的解释。他们试图走出斯坦纳所说的“遗忘崇拜”,通过倾听原住民的讲述,将欧洲的知识体系与以口述传统为特色的原住民历史结合起来,重新发掘和修撰澳大利亚殖民接触时期的历史。左翼史学家认为,在殖民时期,无论从官方还是非官方的角度来看,欧洲殖民者都对原住民采取了种族灭绝和文化灭绝的手段,致使原住民数量锐减,大多数原住民语言丧失,文化传承也被切断。亨利·雷诺兹(Henry Reynolds)的《边疆的另一面》(1981)一书结合文献记载与口述证词,详细描述了欧洲殖民开拓对原住民造成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早期人们对原住民与欧洲定居者之间关系的看法。他在另一部著作《土地的法则》(1987)中强调了在土地所有权问题上,原住民世界观与欧洲文明有着完全不同的判断标准,对一直以来将澳大利亚定义为“无主之地”的法则提出了质疑。左翼史学家的观点直接影响了1992年的马博裁决(the Mabo decision),并促成了1993年《原住民土地所有权法案》的颁布。^②左翼史学家从原住民视角出发重新修撰的历史,对旨在建构国家神话的单一霸权叙事形成了挑战,使澳大利亚的历史研究领域发生了文化转向。如海登·怀特所说,“在社会现实中我们能找到一处‘文化’空间,在那里,任何社会都可以得到解构,都可以被证明不是必然的,而是众多文

^① 关于斯坦纳对“澳大利亚大沉默”现象及原住民口述历史的阐述,还可参见 Stanner, W. E. H., 1979, *White Man Got No Dreaming: Essays, 1938-1973*,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② 1992年澳大利亚高级法院通过的《马博裁决》,承认了原住民是澳大利亚最早的居民,认定“无主之地”的言论不过是一个法律谎言。来自墨累岛的托雷斯海峡岛民埃迪·马博通过坚持不懈的斗争,最终为自己的民族赢得了欧洲法律体系对原住民土地所有权和继承权的认可,这是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在立法上取得的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因“马博案”应运而生的1993年《土地所有权法》为土地所有权的认定程序做出了具体规定,但同时也维持了过去联邦政府无视原住民私有财产权而将土地随意授予他人的行为的合法性。

化当中的一种可能而已”(1999: 316)。

然而,对于这种同情原住民命运的修正历史主义倾向,持右翼观点的史学家则坚决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左翼史学家所使用的“屠杀”“侵略”等字眼忽略了澳大利亚社会中积极的一面,夸大了欧洲移居者与原住民的冲突,是片面的“黑臂章”(black-armband)史观。^① 基斯·温修特尔(Keith Windschuttle)直接否认殖民历史的存在,他在《原住民历史的杜撰》(2002)一书中指出,关于澳大利亚边界地区白人对待原住民的残酷行径的各种历史资料都是杜撰出来的,没有事实依据。他认为对殖民历史的重新书写出于政治目的,夸大了殖民者对原住民的暴力。雷诺兹将这些保守的右翼历史学家的观点称为“白眼罩”(white-blindfold)史观,谴责他们试图通过淡化殖民者对原住民所犯的罪行来粉饰澳大利亚的殖民历史,讽刺他们这种做法就像是给自己戴上了白色的眼罩,完全是自欺欺人(Attwood & Foster, 2003: 16)。澳大利亚历史学界在左翼和右翼历史学家之间展开的这场关于殖民接触时期白人和原住民关系的论辩,被称为澳大利亚的“历史战争”^②,体现了“白人归属中最为根本的焦虑感”(Riggs, 2004: 39)。

澳大利亚历史学界围绕殖民历史修撰进行的论战已经远远超出了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理论研究的范畴,延伸到政治界、法律界、教育界,影响着国家政策和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变成了“整个国家关于民族身份的论战”(Attwood, 2005: 1)。这场有关民族-国家身份塑造及其文化历史渊源的论战在澳大利亚的文化界也得到了热烈的响应。受到这一旷日持久的历史论战的影响,对殖民时期历史进行反思和重构成当代澳大利亚小说的一个显著特色。在社会文化背景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作家们借助小说叙事改变并丰富了人们对原住民文化和历史的理解。小说叙事成为文学与历史对话的平台,原住民作家和非原住

^① 在澳大利亚的文化语境中,经常以原住民与欧洲移居者之间的肤色差异来代表双方的不同立场。“黑臂章”一词是杰弗里·布莱尼(Geoffrey Blainey)在1993年的约翰·莱瑟姆爵士纪念馆讲座(Sir John Latham Memorial Lecture)中首次使用,用以贬低那些为原住民哀悼、批评澳大利亚历史的左翼历史学家。

^② 澳大利亚的“历史战争”(History Wars),指“黑臂章”史观和“白眼罩”史观就修撰澳大利亚殖民时期的历史所进行的针锋相对的论战,参见《历史战争》(Macintyre & Clark, 2003)。

民作家的作品将相互对立的“黑臂章”和“白眼罩”史观并置在一起，两种对抗的历史观之间形成了文本张力，促使读者反思殖民时期欧洲定居者与原住民的交往及冲突。海登·怀特指出，“可以将现在看作是过去的一种延续”，因为“各种社会常规都是以传统、理念、机制、信仰等形式从过去继承下来的”（1987：91）。历史学界对殖民时期历史的修正和争议为小说创作提供了素材，作家们通过对历史的反思与重构，借助文学想象重新思考原住民历史和文化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透过单一的、体制化的宏大叙事揭示出西方思维方式的霸权本质。以口述传统为基础、从原住民视角重新建构的历史为读者提供了新的认识视角。

同时，小说文本对争议历史的表达和重构方式也在历史学界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以凯特·格伦维尔(Kate Grenville)的小说《神秘的河流》(2005)为例，该小说力图打破殖民历史叙事中的“澳大利亚大沉默”，作者将经过精心调研的历史资料融入通过想象对历史进行的重构之中，再现了殖民开拓时期英国殖民者与原住民之间因土地问题发生的冲突。小说出版后在国内外获得热销，但同时也受到了一些历史学家的质疑。历史学家马克·麦克纳(Mark McKenna)认为，小说对历史的重构使“历史真实陷入危机”，“历史学家的文化权威受到挑战”，而这种对过去的重构是站不住脚的，只是“隐藏在创造或伪造的面纱下面”对历史进行的攻击而已，只有正史才能“对真实的过去提出真正的质疑”（转引自 Pinto, 2010: 191）。^①然而我们需要认识到，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小说家是借用历史事件跨越时间、空间和地域探讨人类的共性，历史学家却永远无法像艺术家那样超越时间和文化的限制。由此看来，文学想象是对历史书写的补充和发展。历史学界和文学界关于澳大利亚殖民时期历史的对话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文学作品对历史进行的重新解读体现了当代澳大利亚所推行的多元文化政策。

^① 引文出自2005年12月1日麦克纳在格里菲斯大学的人文写作课程讲座，题目是《书写过去：澳大利亚的历史、文学和公共领域》。

1.2 澳大利亚小说中的身份政治

澳大利亚是一个由英属殖民地逐步发展起来的移民国家，小说中的历史叙事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的影响。历史主题的小说以其明显的政治取向和独具一格的叙事手法，彰显了澳大利亚文学的地方性特色。在澳大利亚文学力图摆脱“文化卑微”状态、探求民族化道路的过程中，原住民主题对文学作品中的民族-国家身份认同及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澳大利亚原住民及托雷斯海峡岛民艺术委员会主席凯西·克雷吉(Cathy Craigie)指出，“任何关于澳大利亚的写作都应该带有潜在的原住民情感，以对原住民的认可或者其他形式出现。如果没有这些，就不可能成就伟大的澳大利亚小说。想要表达澳大利亚精神，就必须做到这一点”^①。

从1920年代开始，许多非原住民作家开始在小说叙事中正面刻画原住民角色，对原住民的处境表达同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和纠正了人们对原住民的看法。代表作品有凯瑟琳·苏珊娜·普里查德(Katherine Susanna Prichard)的《库那图》(*Coonardoo*) (1929)、泽维尔·赫伯特(Xavier Herbert)的《卡普里康尼亚》(*Capricornia*) (1938)、埃莉诺·达克(Eleanor Dark)的《永恒的土地》(*The Timeless Land*) (1941)、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的《沃斯》(*Voss*) (1957)、《战车乘客》(*Riders in the Chariot*) (1961)、托马斯·基尼利(Thomas Keneally)的《吉米·布莱克史密斯之歌》(*The Chant of Jimmie Blacksmith*) (1972)等。这些作家用娴熟的写作技巧描绘了原住民的悲惨处境，力图展现原住民文化的丰富内涵，为原住民在民族-国家身份建构中争取一席之地，使原住民作为主体回到历史叙事的舞台上。然而，虽然这些作家的出发点旨在维护原住民的价值，文本中的

^① 出自安妮塔·海斯(Anita Heiss)1997年10月9日对克雷吉的个人专访，转引自Heiss, Anita, 2003, *Dhuuluu-Yala = To Talk Straight: Publishing Indigenous Literature*, Canberra: Aboriginal Studies Press, 第12页。